

# 艾伦·克鲁格： “幸福经济学”研究员的一生

克鲁格对幸福以及更广泛的精神健康问题的研究，可能更多是个人关注所推动的，正如他对音乐的狂热一般。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

幸福是什么？这个听起来宽泛而又非科学的问题，极少有人将它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中，艾伦·克鲁格则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作为全球经济学界排名前 50 的重量级人物，克鲁格的研究领域广泛，从最低工资、教育，到恐怖主义甚至摇滚音乐会的门票，一一涉足。而这，都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然而，被誉为“幸福经济学”研究员的克鲁格，却于今年 3 月 16 日在家中自杀，年仅 58 岁，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家庭和睦、儿女双全、事业有成，克鲁格的人生看来圆满而幸福，就在他自杀的前几天，他还在斯坦福大学就全民基本收入提议做了演讲。或许，在温柔的外表下，这位致力于让人幸福的经济学家一直在负重前行。

## 三入白宫

克鲁格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劳工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在该领域内是数一数二的。而他的名字广为外界所知，主要是因他曾三度进入白宫、为两任总统效力。

第一次是在 1994 年。当时年仅 34 岁的克鲁格，在劳动力市场已经崭露头角，刚刚被普林斯顿大学任命为终身教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任命他为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不过两年后，克鲁格离任，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由于巨大的压力和责任，他发誓，再也不会回华盛顿了。

但这一誓言终究被打破。2008 年年底，一通来自白宫的电话打到了克鲁格家里，奥巴马亲选的财政部长盖特纳邀请他加盟财政部。当时，美国还处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失业率居高不下。奥巴马承诺将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发展，降低失业率。显然，在劳动力市场钻研的顶级专家克鲁格成为必须要抓住的“救命稻草”。

克鲁格不是没有想过拒绝。但盖特纳说：“美国经济已经处于‘自由落体’的下行状态，你为什么不来财政部做一些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呢？”这个要求让他无法拒绝。而且，克鲁格与奥巴马在哈佛读书期间就已熟识，帮老友一把也是情之所至。因此在 2009 年，克鲁格



艾伦·克鲁格



Alan B. Krueger, 1960年9月17日出生于新泽西州利文斯顿，著名劳工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擅长运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对劳工市场进行研究。他曾三入白宫，助力奥巴马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提振了美国经济。除了经济学，亦在音乐领域等有所涉猎，并将之与经济研究相结合，发表了许多通俗易懂的著作。2019年3月16日于家中自杀，原因不明。

插画 | 网中鱼





成为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和负责经济政策的助理部长。在任期间，他通过小企业信贷基金和广受欢迎的“建立美国债券”计划等措施提振美国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此外，他在“旧车换现金”计划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计划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折扣来刺激汽车销售，让消费者换取更省油的汽车。奥巴马称克鲁格是他提议的很多经济政策背后的“推动力”，但这份肯定并没有留住克鲁格。

在政府部门待不住的克鲁格，两年后又返

回了普林斯顿。没多久他再次被奥巴马请出山，担任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任期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8月。这次，克鲁格发展和普及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的概念，指出收入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会导致一代又一代人的“不健康分化”，阶层固化将会越来越严重。

得知克鲁格逝世的消息后，奥巴马发表声明，称赞克鲁格在金融危机后协助政府提振了美国经济，防止国家进入二次萧条。实际上，最初克鲁格并没有打算在政府部门发光发热，



也没打算学经济学。

1960年9月17日，克鲁格出生在新泽西州利文斯顿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母亲是小学一年级的老师。自小克鲁格就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顺利进入了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读的是工业与劳动关系专业。这时候，克鲁格一心想做个律师。

但在为本科论文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克鲁格发现了实证研究的乐趣。所以本科一毕业，他就跑去哈佛大学读了经济学，4年后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的同年，克鲁格选择了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和继续研究。普林斯顿成为他执教30余年的地方，这里距他童年的故乡也仅仅80公里。他的职业之路从此开始，三度走入白宫更似历练。

### 劳工市场顶级专家

实证研究的乐趣不仅将克鲁格带入了经济

学领域，更让他积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当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领域都在进行一场实证革命，擅长于此的克鲁格来到普林斯顿后，建立了调查研究中心，率先尝试用自然实验的方法研究政府政策的效果，利用数据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难题。

克鲁格为了更好地理解人性，曾“跟踪”了大量失业者，观察他们一天的生活，证明了积极寻找工作是一项令人悲哀的高强度任务。

作为新一代经济学家，克鲁格引领了经验革命，成为劳工市场的顶级专家。这也正是他受白宫青睐的原因。而在他的系列研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对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

凡是鼓吹增加工资，总有一个反对声音在说：提高工资会使企业减少雇佣人数，增加失业率。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本科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认为更高的最低工资会使人们失业。为了弄清楚其中究竟，1990年，克鲁格和经济学家戴维·卡德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的地域主要是新泽西州和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

1992年4月1日，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从每小时4.25美元上涨到每小时5.05美元，而宾夕法尼亚州的最低工资仍然保持每小时4.25美元。克鲁格和卡德通过分析两个州的快餐店数据发现，即便处于经济衰退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新泽西州非但没有增加失业人口，就业还上升了：该州的410家快餐店平均每家增加了约2.5名员工。这并不是说提高最低工资就一定能促进就业，而是提高工资的坏影响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绝对。后来，克鲁格又与卡德合著了《神话与计量学：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一书，主张适度调高最低工资。这些研究否定了保守派的传统观点，影响了数百万美国工人，被称为“最低工资研究的革命”。

克鲁格采用自然实验的创新方法并不只是体现在对工资的研究上，他还研究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他在3年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阿片类药物可以解释20%劳动参与率低下的原因——未出勤的男性中有44%的人在前一天曾





服用过止痛片，美国人均阿片类药物处方率是经济和合作发展组织国家中最高的。而且壮年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服用止痛片的可能性是职场男性的两倍。可见，阿片类药物的过度使用不仅是对各地就业市场的伤害，更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克鲁格的研究支撑了“药物滥用带来坏的经济影响”的结论。

他甚至为了更好地理解人性，去“跟踪”了大量失业者，观察他们一天的生活，证明了积极寻找工作是一项令人悲哀的高强度任务。在这些研究中，他从不凭空推测，而是收集数据。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实验，克鲁格试图让经济学变得人性化，从而影响公共政策以改善劳动力市场。

“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在克鲁格眼里，不是一种希冀，而是需要一步一步靠革命推进的行动。这让他燃起了无限激情，在劳工市场留下了诸多印记。这些印记中，当然也包括他执教30余年来培养的无数学生。

在课堂上，克鲁格用数据和模型来讲述生动的故事，他让一些难以理解或是参与度低的话题变得有趣。他教课用的电子版讲义只有图表，没有笔记，也没有备注功能，但他却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学生问他的问题，他也总是能快速反应，并且给出精彩的回答。即便纠正别人的错误，他也总是面带微笑、一脸温和。而当自己的错误被发现时，他也能坦然接受。

有一次，克鲁格的学生展开的一项研究得到了初步结果，但意味着克鲁格之前的一篇文章的结论是错误的。克鲁格反而鼓励学生进行二次、三次的分析和检查，如果分析是正确的，他将收回之前的论文、承认自己的错误。用克鲁格的话来说，“我们站在真理的一边”。

热情、坚定、博学以及第一手的知识，这些让克鲁格影响了很多同事和学生。他现在的同事、以前的学生亚历克斯·马斯教授，就说

克鲁格是他成为劳动经济学家的原因。

## 跨界“摇滚明星”

克鲁格留给世间的，不仅仅是对劳工市场的研究。他长达 21 页的简历包含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内容和大量的研究著述以及各种头衔。他似乎总有着无止境的好奇心，寻找着各种潜在的研究问题。

“9·11 事件”发生后，一个关键问题被提出：恐怖分子是怎么形成的？普遍的解释是经济落后和教育匮乏导致人们有了极端思想并走向了恐怖主义。可在克鲁格看来，这种解释是基于信仰，而非科学依据，他觉得有必要研究一下。在此之前，恐怖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和政治的传统领地，很少有经济学家涉足。但克鲁格给出了他必须研究这一题目的两点理由：

一是参与恐怖主义只是职业选择经济学的特殊应用。有人选择成为医生、律师，有人选择成为恐怖分子。而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是为什么。二是在 1997 年，他就针对德国 543 个城镇的犯罪率进行了研究，发现恶劣的经济条件并不能刺激人们产生仇恨犯罪。

2008 年，基于 143 个国家的民意调查和对恐怖活动进行分析，克鲁格写了《什么造就了恐怖分子》一书。这部“跨界”著作一经出版，就好评如潮。书中指出，绝大多数恐怖分子实际上来自中产阶级，而且接受过大学教育，因此他提出美国不应该浪费时间试图通过援助和教育来打击恐怖主义。他的研究也首次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的领导和政策持否定态度时，恐怖行为更有可能发生，而经济发达、公民自由程度高的国家最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

克鲁格的跨界远不止在恐怖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上，他还研究音乐。空闲之余，克鲁格对音乐有着狂热的爱好，尤其是摇滚乐。早年他

无止境的好奇心，让克鲁格始终保持着强劲的研究能力，而这也可能将他一次又一次置于探索的洪荒中。他的内心世界如何，无从得知。

组过乐队，担任吉他手，梳着朋克风格的发型。要是跟他聊起鲍勃·迪伦，话匣子就关不上了。

枯燥的经济学与狂乱的摇滚乐，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领域，却因为克鲁格的专业与爱好联系在了一起。他经常举音乐领域的例子，来阐述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看法。比如他曾用演唱会门票价格的飞涨来形容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排名前 5% 的表演者拿走了 90% 的收入，音乐产业将现实世界“赢者通吃”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

克鲁格研究的是关注普通人生活的经济学，也想让普通人能懂点经济常识，避免屡屡做出错误的财政决策。所以，他决定干脆借对音乐领域的研究出版一本大众图书，书名叫《摇滚经济学》。书里搜集了很多著名歌星的例子，包括泰勒·斯威夫特等。这部 300 多页的专著预计于今年 6 月出版，但克鲁格已经看不到了。

就克鲁格的研究来说，劳工市场、恐怖主义、摇滚经济以及他所关注的环境污染、教育医疗等，无不关乎普通人能否幸福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他还切实研究过幸福经济学。他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尔曼合著了名为《幸福》的论文，研究了“主观幸福感”。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有关幸福的最好论文之一。他还与卡尔曼提出建立“国民幸福指数”。现在看来，克鲁格对幸福以及更广泛的精神健康问题研究，可能更多是个人关注所推动的，正如他对音乐的狂热一般。

无止境的好奇心，让克鲁格始终保持着强劲的研究能力，而这也可能将他一次又一次置于探索的洪荒中。他的内心世界如何，无从得知。58 岁于学者而言，是才开始收获硕果的年纪，而他却选择离去，确实让人叹息。但毫无疑问，他引领了实证经济学的革命，并努力影响政策以改变世界，这已无愧当代“经济学大师”之名。□